

# 犹太教困境与犹太人困境下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

刘辉萍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从18世纪开始,犹太人为寻求平等和自由,纷纷背弃犹太教,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也随之淡漠;19世纪末,欧洲大规模的反犹浪潮再起,犹太人陷入了两难境地。为寻求犹太民族的生存之道,阿哈德·哈姆提出了文化犹太复国主义。

**关键词:**阿哈德·哈姆;犹太教;文化犹太复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K38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9)05-0056-04

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是19世纪末产生于东欧,却影响了整个犹太人世界的犹太民族主义思潮之一,属文化民族主义范畴。该思想由东欧著名的犹太思想家、政论家、文学家阿哈德·哈姆<sup>1</sup>首次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述,其核心内容是强调防止犹太民族分裂和消亡的关键是复兴犹太传统文化,哈姆所谓的犹太传统文化就是指塑造了犹太民族独特的族性特征的古老犹太教文化。但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并非犹太文化复古主义,而是“对哺育他们成长的传统的犹太教遗产,和从具有‘批评思想’的俄国知识分子及受到他们尊敬的法国、英国和德国思想家的著作中吸取的世俗观念进行综合”[1](P678)。这一思想的具体含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用进化论的观点看待犹太教。(2)重新唤起犹太人对犹太教的忠诚。(3)复兴希伯来语。(4)发展犹太传统教育。(5)把巴勒斯坦建设成为犹太人的文化中心。哈姆复国思想中的“国”是一种新型的中心,“它既不一定非得是一个犹太人的政治中心,也不一定是受迫害犹太人的避难所,预期在巴勒斯坦建立的中心应该是一个体现先知犹太教思想的中心”[2](P25)。犹太教的全部精神将从巴勒斯坦地散发出夺目光彩,射向“辽阔的周围地区和所有散居区的犹太社群,鼓舞他们建设新生活,同时保持我们民族的完全统一”[1](P680)。

哈姆的这一思想是深刻反思犹太教困境和犹太人困境而提出的拯救犹太民族的途径。

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双重危机的产物。犹太文化危机直接表现为犹太教的困境,是与犹太人的同化及解放同步发展的。犹太人的同化始于18世纪初,由德国著名的犹太宗教改革者摩西·门德尔松首倡。门德尔松主张犹太人学习德语、欧洲礼仪和文化,以求把犹太人从“隔都”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重新融入现代社会。门德尔松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走出“隔都”的犹太人走得太远,完全背离了犹太教。门德尔松的宗教改革运动在不经意间从犹太社会内部瓦解着犹太教。犹太人的信仰伴随着犹太人的解放出现了明显衰退的趋势:犹太教律法得不到的遵守,犹太人的民族语言——希伯来语也仅仅使用在祈祷中,德语成为犹太人的日常用语。1789年,即门德尔松逝世后的第三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为犹太人的解放又提供了新的契机。法国的犹太人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并随机引起了连锁反应。“法国犹太人解放是西欧、中欧和南欧犹太人的生活 and 前途的转折标志。随着拿破仑(1769-1821)横扫欧洲,法国大革命的平等思想也一道传播到他所占领或吞并的国家”[3](P81)。大革命在给犹太人带来自由、平等的同时也

收稿日期:2007-10-25

作者简介:刘辉萍(1974-),女,山东平度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sup>1</sup> 原名阿舍·Z·金诗伯(Asher Zervi Ginsberg),阿哈德·哈姆是其长大后写作用的笔名,意为犹太民族的一员。

从外部冲击着犹太人的信仰。

在宗教改革运动及法国大革命的内外夹击下,到19世纪30年代,在德国,无论普通犹太人还是犹太学者的希伯来语知识都十分贫乏。1848年,一位犹太拉比曾说德国的犹太青年十之八九以他们的宗教信仰为耻。犹太人纷纷改宗,“尤其是那些领袖人物都曾受改宗的影响,实际上是知识界,是那些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地位和声望的人。在某些社团,几乎所有有名望的家族都改宗了”[4](P18),如门德尔松、海涅等都接受了洗礼,改信基督教。一些由犹太精英组成的社团开始消失,犹太教已经名存实亡了。到19世纪中叶,德国犹太人认为他们不是一个民族。当时一位解放论者加不里尔·里塞尔曾说:“如果一个犹太人愿意选择一个不存在的国家和民族(以色列)而不要德国,那么,这样的犹太人应被置于警察的保护之下,这样做不是因为他的观点具有危险性,而是因为他是个精神病患者。”[4](P10)可见,改宗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自然的、合乎情理的事情,反之就失常了。对犹太教的背叛和放弃还表现为与异族通婚,犹太教禁止异族通婚,但在犹太人中,出于对政治、经济等方面平等的诉求,尤其是犹太上层,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柏林和汉堡的犹太人配偶当中,每两对就有一对是异族通婚;1915年(大家公认这一年的情况不具有典型性),在德国异族通婚实际上比配偶双方都是犹太人的还要多”[4](P30-31)。

在法国,犹太人的同化情况与德国非常接近。改宗、与异族通婚是犹太人中的普遍现象,19世纪,法国犹太人已经成为了法国平等的公民。“无论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年轻人都已完全被他们的非犹太人环境所并吞;除了他们所属的那个阵营的人生观之外,他们再没有任何其它的想法”[4](P4),并且他们的爱国热情异常强烈,强调对法兰西民族的依附,相反犹太历史和传统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犹太教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更有甚者,激进的同化者主张完全同化,犹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应该消失。难怪犹太人在法国刚取得公民权之时,法国的克雷蒙·托尼埃及伯爵就在国民议会声明:“对于作为个体的犹太人来说,他获得了一切;而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则一无所获。”[3](P79)

东欧犹太人的同化运动晚于西欧,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犹太知识分子呼吁犹太人应该把俄语作为自己的语言,努力学习俄国人的生活方式,获得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使自己成为俄国人。

总体来看,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80年代前,同化在欧洲各国犹太人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犹太教的衰落和犹太民族意识的丧失。尽管有些犹太人对犹太教的价值、犹太传统及其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深信不疑。“虽然犹太教曾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像化石一样,已经僵死了;它已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宗教信仰”[4](P20)。犹太人的精神壁垒倒塌了,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也在同化的过程中迅速而又彻底地被削弱了。

针对上述情况,1891年哈姆发表了《自由中的奴役》一文,认为在解放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迷路了”[5](P172),“西方犹太人在内心深处知道他们并不自由,因为他们没有民族文化。政治自由的背后隐藏着另一种也许是更可怕的奴役即精神奴役”[5](P10)。融入寄居国的努力不仅使犹太人肉体被放逐了,连精神也无家可归。如何挽救犹太民族于危亡之中,哈姆认为,最为有效的、也是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重新唤起犹太人对犹太教及其经典《希伯来圣经》的忠诚。“《希伯来圣经》是像犹太这样一个贫穷、被掠夺、被驱逐的民族能够寻得一种不同生活——一种既有自由又有尊严生活——的唯一源泉”[2](194)。

从公元前586年古犹太王国被新巴比伦王国灭亡开始,此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犹太民族一直是一个丧失主权的民族。公元135年犹太人最后一次起义被罗马皇帝哈德良镇压,犹太人彻底丧失了家园,流浪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各国。此后,驱逐、屠杀、迫害就像幽灵一样追随着犹太人,并呈现出长期性、周期性、反复性、残酷性、广泛性的特点,直到中世纪结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高举理性、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让犹太人的生活不但发生了全新的变化,而且在痛失家园1500多年后终于又重获公民权,所以犹太人对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留恋和痛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没有19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反犹太主义的兴起,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很可能会像中国开封的犹太人被汉化一样被欧化。然而,出乎犹太人意料的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对犹太人大规模的驱逐、迫害、屠杀死灰复燃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究其原因是1879年后欧洲发生了战争并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动荡,犹太人成为了欧洲人排解挫折感的对象,不得不承受各种各样的攻击,犹太人重陷困境。“欧洲现代反犹太主义的发展与犹太人的同化、世俗化以及犹太教所体现的宗教观、价值观逐渐失去它的影响力是同步的”[6](P4)。

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进行的最为彻底的国家,自由、平等思想的积极倡导者,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也是欧洲现代反犹太主义的故乡,这不能不引起犹太人对他们未来的深思。“法国现代反犹太主义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久远,如同法国犹太人的解放也早于其他欧洲国家。这可追溯到18世纪末叶”[6](P46);“现代反犹太主义的态势出现在法国要比出现在德国和奥地利早50年”[6](P47)。欧洲现代反犹太主义在19世纪晚期的法国,尤其在1885年以后,达到其高潮,标志性事件是德雷福斯案件。1894年,一位名叫德雷福斯的、在法国军队中担任上尉的犹太人被指控向德国情报部门出卖情报被逮捕,并被判终身监禁,发配至魔鬼岛。尽管事后德雷福斯被证明是清白的,并于1899年被带回法国重新审判,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再次被判有罪,判决显然有失公正,当时的法国总统不得不尴尬地特赦了德雷福斯。德雷福斯案件并没有结束,以此为契机,法国政府把国家几乎所有的不幸都归罪于犹太人的阴谋诡计,开始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甚至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都未能幸免于难。不但如此,法国的反犹运动还像瘟疫一样迅速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在德国,反犹太主义本是德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它为德国提供了一个“文化传承模式”。德国反犹太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犹太人的一切从本质上说都具有破坏性,需要将犹太人的影响从社会中彻底清除。加之法国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德国,迫害犹太人的事件层出不穷。而在东欧,沙皇俄国反犹运动的残酷性在整个欧洲反犹运动的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1882年3月俄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经调查凶手并不是犹太人,但在抓获的数位嫌疑犯中有一位犹太女子,顿时谣言四起,犹太人莫名其妙地成了真正凶手的替罪羊。一个月后,俄国大规模的驱犹、屠犹运动开始,乌克兰的伊丽莎白格拉德镇第一次发生袭击犹太人的事件,随后类似的袭击行动在周围近30个城镇发生。1881年5月初,迫害行动扩大到赫尔松、陶里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波尔塔瓦和切尔尼戈夫等城镇[7](P188)。1883年春天,罗斯托夫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及其周围地区突然出现新的袭击犹太人事件。1884年7月,下诺夫哥罗德发生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反犹浪潮中的最后一一起大规模袭击犹太人的事件。在这次历时四年的集体迫害犹太人的浪潮中,仅在俄国南部地区就有200多个城镇的犹太人遭到袭击,他们的财产不是遭抢劫,就是被毁坏。在莫斯科,约有2万犹太人

遭到驱逐[8](P637)。1882年5月,沙俄政府新上任的内政部长伊格纳切夫颁布了臭名昭著的“五月法令”,明文禁止犹太人在“栅栏区”内外建立任何新居民点,允许乡村居民将“有罪的犹太人”赶走;禁止犹太人在星期天及其它基督教节日里经营生意,并对他们关闭了大多数专门行业、工业和农业中就业机会的大门;还限制犹太子弟的入学人数。1887年7月,俄国教育部正式规定犹太学生进入大学和中学的人数比例:在“栅栏区”以内最多不得超过10%,在“栅栏区”以外不得超过5%,在首都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不得超过3%。在1881年反犹浪潮掀起之后,大约有40%的俄国犹太人失去生计,靠救济度日。

俄国爆发的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浪潮很快蔓延到东欧其他一些国家,如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匈牙利出现了主要由贵族发起的反犹政治运动,19世纪80年代初期,全匈牙利掀起了反犹浪潮,而且长期未能平息。19世纪90年代,波兰反犹太主义分子领袖罗曼·德莫夫斯基声称,犹太人是一个与波兰精神格格不入的民族,绝不可能被同化,只会在波兰人中散布异化的令人厌恶的思想,他的恶意宣传和行动引发了波兰公众的反犹情绪。在罗马尼亚,犹太人从未获得过公民权,19世纪80年代之后,罗马尼亚更是紧随俄国,加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犹太人的解放是短暂的,犹太人再一次被完全抛弃了,犹太人开始认识到改变宗教信仰,抛弃传统都不能使犹太人变成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等,因而,也就无法根本改观他们遭受迫害的命运。正是欧洲的反犹运动直接催生了哈姆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到19世纪末期,犹太教困境与犹太人困境出现了并存的局面,这也折射出欧洲各国对犹太人的憎恨是一种多维偏见:19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是宗教、经济反犹太主义,为求生存,犹太人或自愿或被迫选择了同化;70年代以后的现代反犹太主义把矛头直指被同化者,种族、血缘是无法改变的,犹太民族陷入了两难境地。

犹太民族该如何生存下去而免于消亡的命运呢?此时的犹太知识分子提出了种种拯救方案。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张着眼于个体,首先挽救犹太人于苦难中,而无视犹太教的困境,其具体措施就是把散居各国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国家。此主张一经提出便遭到了哈姆的强烈的质疑和反对。1889年哈姆发表了

《这不是道路》( This is not the way ), 指出“ 移民计划是本末倒置” [ 2 ] ( P21 ), 是一种救火的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计。巴勒斯坦面积仅 2. 7 万平方公里, 能移居巴勒斯坦的毕竟只是散居犹太人中很小的一部分, 散居是不可改变的客观现实, 如何保持散居地犹太人的族性特征是关系犹太民族存亡的关键。哈姆明确指出: “ 一个犹太国的创立是决不会为生活在世界上的大多数犹太人提供一个避难所 …… 散居犹太人将不得不依靠一种与现代精神一致的犹太教哲学的滋润。” [ 2 ] ( P23 ) 所以, 犹太教问题先于犹太人问题, 没有灵魂的国家只能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非犹太国。此后, 他以这一思想为主题发表了《宗教与世俗》( sacred and profane )、《正义和怜悯》( justice and mercy )、《消极和积极》( positive and negative )、《期待与幸存》( anticipations and survivals )、《灵与肉》( flesh and spirit )、《自由中的奴役》( slavery in freedom )、《价值重估》( the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精神复苏》( the spiritual revival ) 等一系列的论文, 阐述自己的主张。

1891 年和 1893 年, 哈姆两次亲自前往巴勒斯坦进行实地调查, 在调查的基础上哈姆发表了题为《以色列地的真相》的系列文章, 指出: “ 开拓居住地如果不是匆忙行事, 而是脚踏实地并使之具有适当的规模是有可能成功的。所有这些因素巴勒斯坦都不具备, 因而不能吸引犹太民众。巴勒斯坦应该是犹太文化和精神的中心, 而不是它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 4 ] ( P98 ) 尤其是 1893 年的巴勒斯坦之行对哈姆的思想触动巨大, 在犹太人的哭墙他见到了痛苦祈祷的犹太同胞, 其情景令哈姆思绪万千: 被毁灭的以色列国家可以重建, 只要犹太民族依然生机勃勃, 但如果犹太民族被灭, 该从哪儿获得救赎呢? 哈姆认

为: “ 对于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犹太人来说, 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犹太教的民族性是十分必要的。” [ 2 ] ( P43 )

哈姆在同旨在建立一个犹太国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中, 发展了一种被称作“ 文化复国主义” 的思想。哈姆的文章语言简洁而洗练、尖锐泼辣、充满力量,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章中作者的人格风范, 吸引了大批追随者。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修正观并非无视为个体的犹太人, 相反, 哈姆试图通过呼唤犹太人心灵的复苏全面复兴犹太民族, 因为没有犹太民族也就无所谓犹太人。此后, 犹太历史的发展证明, 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对唤醒犹太民族意识、重塑犹太民族精神、凝聚犹太民族文化认同、尤其是以色列国的建立和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 1 ] [ 美 ] 罗伯特· M · 塞尔茨. 犹太的思想[ M ]. 赵立行, 冯玮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 2 ] [ 美 ] 高乔克. 理性之光——阿哈德· 哈姆与犹太精神[ M ]. 徐新, 张利伟, 游炜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 3 ] [ 美 ] 大为· 鲁达夫斯基. 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 M ]. 傅有德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 4 ] [ 美 ] 沃尔特· 拉克. 犹太复国主义史[ M ]. 徐方, 阎瑞松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2.

[ 5 ] Leon Simon. Selected Essays by Ahad Ha- am[ C ].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12.

[ 6 ]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M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 7 ] 徐新. 反犹主义解析[ M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 8 ] 徐新. 犹太百科全书[ Z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杨春梅

A Discussion on Rising of Ahad Ha am’s Spiritual Zionism

Liu Hui ping

( Department of Marx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Shandong Province 276826 , China )

**Abstract:** From 18th century, along with the religion reform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jews began to be crippled. In the late of 19th century, the antijewish wave was rising in most of European countries, jews were trapped in a dilemma. In order to rescue jews Ahad Ha am put forward the Spiritual Zionism.

**Key words:** Ahad. Ha am; Spiritual Zionism; Judaism